

日本政黨輪替思維之探析 －兼論民主黨的角色與定位

李世暉

(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助理教授)

郭國興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貿易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政黨輪替是當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條件。日本的民主政治雖然在戰後新憲法公布後即開始進行，但自 1955 年起便形成自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這是因為，日本戰後的政黨輪替思維，受限於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與政黨條件等國內外環境的影響，使其無法在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具體展現。冷戰結束後政經情勢的轉變，讓日本的政黨輪替思維獲得解放，也促成了日本民主黨的成立與發展。本文主旨是藉由民主理論與近代日本政治發展觀點，思考政黨輪替思維在日本的演變歷程，並以日本民主黨的成立背景、組織發展來分析其在政黨輪替思維演變中的角色與定位。

關鍵詞：政黨輪替、民主黨、自民黨、憲政常道

* * *

壹、前言

「政黨輪替」(party alternation) 顧名思義，是一政黨取代另一政黨在一國家或地區的統治權力。原本在字詞意義上，政黨輪替只是用以描述政黨之間權力交替的現象，但在民主思潮的趨勢，以及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發展經驗的影響下，此一名詞經常與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黨選舉等概念同時出現，用以描述一國政治現狀，或為評估民主政治之指標。以臺灣為例，源於 1980 年代中期的民主化運動，歷經民主過渡 (transition phase) 時期逐步消除民主的障礙後，藉由 2000 年總統選舉的首次政黨輪替，進入了民主政治的決定階段 (decision phase)。而 2008 年的二次政黨輪替，則是

通過 Samuel P. Huntington 提出的「雙翻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正式邁向民主鞏固階段 (consolidated phase)。^①

民主化進程遠早於臺灣的日本，直至 2009 年 9 月才實現「實質」(real) 的政黨輪替。雖然在二次戰後初期曾出現短暫的政黨輪替現象，但 James Lee Ray 認為，1993 年日本新黨的細川護熙內閣取代自民黨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的宮澤喜一內閣，才是日本戰後第一次的政黨輪替。^②然而，當時執政黨聯盟中的重要政黨如日本新黨、新生黨與新黨先驅 (新党さきがけ)，均由原自民黨議員臨時脫黨組成，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輪替概念有所不同。1993 年的輪替，可以視為自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的延長，比較接近「政治權力輪替」(political power alternation) 的概念，也就是單純的政權改變。2009 年 8 月 30 日，第 45 屆眾議院總選舉的結果，在野的日本民主黨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 獲得過半議席，讓戰後亞洲民主國家代表的日本，正式進入民主政治的決定階段。

戰後日本政治的相關研究，長期以來均以自民黨政權的運作以及自民黨組織的發展為焦點。1990 年初期日本政治的變局，促使研究者集中關注戰後自民黨何以長期維持一黨獨大統治體制的相關議題上，此為日本政治研究的第一個轉換點。^③對於自民黨一黨獨大體制，政治學者多以冷戰體制與選舉制度的角度加以分析，主張國際冷戰秩序的制約，國內「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ing, SNTV) 的施行，^④以及「政官財」(政治、官僚、財團) 利益共同體的出現，是導致此一體制存續的主要原因。^⑤日本政治學家小林良彰則進一步指出，議員定數不均衡、自民黨對於危機的自

註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s: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266-267.

註② James Lee Ray,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Evolu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position*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5).

註③ 本文所論及之一黨獨大體制，乃是採行 Giovanni Sartori 的「一黨優位政黨制」(predominant-party system) 概念，是指在民主競爭政黨政治下，第一大黨與第二大黨在國會議席上有顯著差距，且第一大黨歷經三、四次以上選舉仍然持續掌握國會多數與行政權。參照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註④ 日本在戰後所實施的選舉制度為「大選區區制」的一種，在學理上一般稱之為「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ing, SNTV)。其特色包括：一、每位選民投一票給特定候選人；二、候選人所得的選票不得轉移給他人；三、每一選區應選名額通常大於一；四、當選與否完全取決於候選人的得票排名。詳細論述可參照林繼文，「制度選擇如何可能：論日本之選舉制度改革」，*台灣政治學刊*，第 2 期 (1997 年)，頁 63-106。

註⑤ 國際冷戰秩序的形成，使得日本國內傾向維持穩定的政治環境，並以之為戰後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有利於自民黨長期政權的維繫。另一方面，日本的 SNTV 是在 130 個選區中選出將近 500 名議員，若一黨欲單獨過半，則必須在每個選區推出至少兩名的候選人。除了自民黨之外，資源、人才不足的社會黨與共產黨大多依循「一選區一候選人」的原則，其結果影響了日本的政黨輪替的發展。相關論述可參照 J. Mark Ramseyer and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北岡伸一，*自民黨一政權黨の 38 年* (東京：讀賣新聞出版社，1995 年)；楊鈞池，「後冷戰時期日本聯合政府與政治改革」，*政治科學論叢*，第 16 期 (2002 年)，頁 63-88。

我調整機制、選民對政治的冷漠、缺乏有力的反對黨、日本經濟穩定成長的事實，促使日本人民選擇此一政治體制。^⑥

2007 年的參議院選舉，民主黨在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區的得票率（分別為 40.45% 與 39.48%），遠遠超過自民黨（分別為 31.35% 與 28.08%），一躍成為參議院最大黨之後，戰後日本政治研究出現了第二個轉換點，民主黨開始成為政治學家關注的焦點。早期的民主黨相關文獻，多以鳩山由紀夫、岡田克也、小澤一郎等重要政治人物的傳記形式出現。^⑦這些資料的撰寫者以政治記者居多，立場傾向民主黨者的出版品，通常會成為政黨文宣的一種；立場傾向自民黨者，則多把焦點放在民主黨政治人物錯綜複雜的人脈、金脈關係上。2007 年之後的研究，則多把重心放在民主黨的組織發展上，如鹽田潮以歷屆民主黨黨主席的理念、政策為分析重點，描述民主黨成立以來的重大事件，以及這些重大事件背後的政治經濟環境因素。^⑧橘民義則是有系統地分析民主黨的組織、政策與其地方網絡關係。^⑨然而，因政治立場差異而出現不同論述的現象，在此一階段更為明顯。^⑩

隨著民主黨的發展而衍生出的政黨輪替議題，則是從 2009 年才開始被提出討論。如後房雄以義大利的選舉制度變革與政治發展，論述「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之下，政黨競爭策略的選擇以及日本政黨輪替的可能性。^⑪山口二郎則從英美兩黨制的歷史與政治理論著手，一方面論述自民黨政權的危機矛盾與政黨輪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則從民主黨的理念、領導者能力與組織層面，分析民主黨政權成立的可能性。^⑫而讀賣新聞社與早稻田大學則是以選前與選後民意調查的資料，以數據、圖表呈現日本選民的態度變化，說明民主黨大勝與自民黨大敗的關鍵在於：對自民黨的不滿情緒結合期盼了政黨輪替的心情。^⑬

然而，日本人民對自民黨的不滿與期盼政黨輪替的心情並非始於今日，卻何以遲至 2009 年才出現政黨輪替？不可諱言地，前述之國際局勢、選舉制度、「政官財」體

註⑥ 小林良彰，現代日本の政治過程：日本型民主主義の計量分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頁 227~228。

註⑦ 如蛭田有一，鳩山由紀夫－蛭田有一フォト・インタビュー集（東京：求龍堂，2002年）；榊原夏，岡田克也－父と子の野望（東京：扶桑社，2004年），以及小澤一郎，剛腕維新（東京：角川書店，2006年）。

註⑧ 鹽田潮，民主党的研究（東京：平凡社，2007年）。

註⑨ 橘民義編著，民主党 10 年史（東京：第一書林，2008年）。

註⑩ 例如，曾擔任自民黨本部事務局長的伊藤惇夫，以批判的觀點論述民主黨的金流、人脈與派系，並指出其弱點在於理念的欠缺與組織的鬆散；立場傾向民主黨的政經俱樂部則是透過政策對談的方式，闡述民主黨的理念。見伊藤惇夫，民主党－野望と野合のメカニズム（東京：新潮社，2008年）；政經俱樂部編，民主党の若手議員は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東京：ワンツーマガジン社，2007年）。

註⑪ 後房雄，政權交代への軌跡－小選挙区制型民主主義と政党戦略（東京：花伝社，2009年）。

註⑫ 山口二郎，政權交代論（東京：岩波書店，2009年）。

註⑬ 田中愛治、河野勝、日野愛郎、飯田健、読売新聞世論調査部，2009 年なぜ政權交代だったのか－読売・早稲田の共同調査で読みとく日本政治の転換（東京：勁草書房，2009年）。

制、反對勢力發展、選民政治態度等因素，均可視為影響日本政黨輪替與否的變數；但是，選民對這些變數的理解、認知與判斷所形成的政黨輪替思維，才是決定日本政黨輪替能否實現的關鍵。對此，無論是日本國內還是國外的政治學者，均未曾對此展開相關的研究。有鑑於此，本文乃藉由日本政黨輪替思維與其民主政治發展關聯的探討，試圖對下列問題進行分析：第一，政黨輪替概念與民主政治的發展；第二，日本戰前的憲政常道與政黨輪替思維的起源；第三，日本戰後民主的局限與政黨輪替思維的變遷；第四，國內外環境的轉變，形塑當代日本的政黨輪替思維。除此之外，本文亦將進一步分析 1990 年代成立的日本民主黨在當代日本政黨輪替思維變遷，以及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定位。

貳、文獻探討

「思維」(thinking) 是一項純粹的心靈活動 (invisible activity)。它是個人從察覺問題到產生反應的中介過程 (mediating process)，也是個人思考的心理歷程與結果。在此定義下的思維一詞，是哲學與心理學所探討的核心議題，並發展出諸如觀念、推論、批判、理性與認同等重要概念。例如，著名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 G. H. Mead 主張，思維是「過去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的一種溝通過程，是自我認同的重要階段。^⑭另一方面，隨著人類事務朝向多元化 (plurality) 與複雜性 (complexity) 的發展趨勢，政治領域逐漸凌駕其他領域；而與政治相關的「善的理念」(idea of good)、「正義」(justice)、「民主」(democracy) 與「自由」(freedom) 等普遍性概念，逐漸成為思維所關注的對象。對此，德國政治哲學家 Hannah Arendt 主張，人類社會存在著相互瞭解的必要，天生具有「共同感覺」(commonsense) 與「共同體意識」(community sense)；而個人思維必須受到他人檢驗，以符合「普遍可溝通性」(general communicability)。^⑮思維的普遍性概念與共同體意識的結合，衍生出政治判斷的議題，亦即價值與善惡尺度的思考。而在政治判斷的過程中，普遍可溝通性所蘊含的說服層面，既是一種公共性的體現，也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⑯

思維作為政治判斷過程的分析概念，至少涉及下列兩項命題。第一，「認為某項事物是事實」(think that something is the case)；第二，「思考何者為事實」(think out what is the case)。前者意指個人信念、集體觀念與意識形態，是一種經驗知識；而後者則與公平正義的倫理道德基準有關，是一種價值判斷。無論是經驗知識還是價值

註⑭ G. H.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 21.

註⑮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Delivered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R. Beiner (ed.),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 40.

註⑯ 江宜樞，「政治判斷如何可能？簡述漢娜·鄂蘭晚年作品的關懷」，當代，第 150 期（2000 年），頁 39~40。

判斷，民主社會中相關政治思維的形成，必定是社會成員彼此溝通的結果，也是共同體意識的一種呈現。進一步地說，政治思考產生政治思維，影響了政治判斷，也制約了政治行動。^{①⑦}關於社會成員政治思維的研究，通常不外乎下列兩種途徑：第一，以政治人物的言行、公共輿論來分析政治情勢與社會氛圍，理解社會的主流政治思維；屬於敘述式的、質性的分析。此一研究途徑立基於下述政治現實，即選民經常無法獨立形成政治意見，其政治思維的形成大多來自於對政治人物言行舉動的反映；^{①⑧}而選民對於政治人物言行的認知，主要來自於媒體報導與輿論意見。第二，以民意調查、投票行為的數據呈現社會成員的政治態度；屬於統計的、量化的研究。此一研究途徑則是奠基於 1960 年代以來的行為主義 (behaviouralism) 政治分析取向。

上述兩種分析途徑皆認為，社會成員的政治思維從來就不是一種自由意志，而是各種外在因素制約下的反應，因而可根據特定環境下意見領袖的反應或社會成員的反射行為來進行解釋與分析。本文所指稱的政黨輪替思維，乃是依循上述的理論主張，用以指稱社會成員在各種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影響下，進行思考後的政治判斷與政治態度；而此一政黨輪替思維在民意調查中是以政黨支持的方式，在選舉行為中則是以投票意向與投票結果的形式呈現。值得注意的是，政黨輪替思維不僅是民主政治發展的產物，也是評量民主的判斷基準。因此，當探討政黨輪替思維時，必須先說明作為政黨輪替思維基礎的民主意識與民主條件，再從民主意識的塑造以及政黨輪替的條件，分析政黨輪替思維對當代民主政治所可能產生的作用。

一、民主與民主的條件

根據成文於西元前 16 世紀至前 11 世紀的《梨俱吠陀》(Rig-Veda) 讚歌記載，古代印度的君主制度下，就已存在 Sabha (長老集會) 與 Samiti (全族男性特別集會) 等抑制君權、具備民主色彩的機制，可視為最原始的民主思維。而社會科學所關注與探討的「民主」或「民主政治」(democracy) 概念，則是以西元前八世紀至前四世紀的希臘城邦時期政治機制為背景。當時，以雅典為首的部分城邦，選擇了不同於君主或貴族統治的「平民大眾統治形態」，並將此一平民政府稱之為「民主政治」(demokratia)。此一時期的民主思維，在史學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 歸納整理，以及柏拉圖 (Plato) 與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批評論述下，成為西方民主政治的濫

註①⑦ Hannah Arendt 曾將人類的心靈活動分為「思考」(thinking)、「意志」(willing) 與「判斷」(judging)。其中的思考一詞，其意義與本文的「思維」(thinking) 概念相同。Arendt 進一步指出，思考(思維)是內心無聲的對話，體現了意識中的異同之辯，並由此產生個人意志與判斷準則，成為人們行為的依據。參照 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Mind, Vol. 1, Thinking* (New York: Brace Jovanovich, 1978), pp. 191~193.

註①⑧ V. O. Key,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Rationality in Presidential Voting, 1936-1960* (New York: Vintage, 1966).

觸。①⑨值得注意的是，希臘城邦的民主概念與現代社會所認知的民主概念存在許多重大差別，包括成為城邦公民的條件相對嚴苛、以直接民主進行決議、以抽籤方式代替選舉等。

希臘城邦式的民主思維，在西方君主制度與天主教會的勢力下，銷聲匿跡兩千年之久，一直要到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Montesquieu）、盧梭（Rousseau）等啓蒙哲學家以理性重新思考，現代的民主概念才逐漸成形。與此同時，美國獨立（1776年）與法國大革命（1789年）的相繼發生，則是開啓了現代民主國家的發展之道。獨立後的美國，揚棄原宗主國英國的君主立憲制，也不採行希臘城邦式的純粹民主制（直接民主），而是秉持主權在民的思維建立代議制的民主共和政府形態。這是因為一個由少數公民所組成，並集合在一起親自管理政府事務的純粹民主的國家，無力糾正當時美國國內政黨相爭的弊病；而代議政體的共和國則提供了解決之道。①⑩自此之後，主權在民、代議選舉、少數服從多數等概念，逐漸內化成爲民主政治的內涵，也形塑了現代民主政治的雛形。

事實上，在民主概念之相關論述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民主政治的條件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有著不同的認知。希臘城邦時期的民主思維、啓蒙時代的民主思維以及現代的民主思維，都受到其特殊背景下之文化慣性的影響，而有不同的意涵與運作條件。即使是現代的民主與自由主義制度，若要順利運作，就必須和若干「前現代」（pre-modern）的文化習慣並存共容，才能確保這些制度的運行無誤。①⑪基於民主概念意涵的歧異，民主政治的條件亦出現各種不同的論述。英國政治學家 David Held 曾言，若以希臘城邦時期的民主政治條件來看，目前世界上所有國家均可自稱爲民主國家；①⑫ Austin Ranney 則將民主政治定義爲：一個依據主權在民、政治平等、人民諮商與多數決原則所組成的政府形式。①⑬

另一方面，政治學者如 Robert Dahl 與 Ted Gurr 等，則是嘗試建立民主化指標以標示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前者提出「多元政體」（polyarchy）的概念，強調現代民主國家的政治權力應由多人或多個政黨共同分享，其成立條件包括：選舉出的官吏管理行政權、自由公正的選舉、普通選舉、政治職位的公開性、表現的自由、替代資訊（反對意見）的取得，以及公民社會組織的自治；符合上述指標的政體，則可視爲多元政

註①⑨ 柏拉圖主張最佳的政治形態爲「哲人政治」（aristocracy），以理智較高的哲人領導理智平庸的一般人，才能建立真理與正義。他對當時的民主政治有如下的批評：「在這種國家裡，如果你有資格掌權，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權；如果你不願意服從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從，沒有什麼勉強你的。……這種政體不加區別地把一種平等給予所有的人，不管他們是不是真的平等」。見郭斌和、張竹明譯，Plato 原著，*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332-333。

註①⑩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Based on the original McLean edition of 1788), pp. 122-128.

註①⑪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註①⑫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

註①⑬ Austin Ranney, *Governing* (8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1), p. 95.

體。^⑭後者則是提出 Polity Project，並以此長期觀察全球政體的變化。^⑮ Polity Project 是透過下述的六項構面，來評估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分別是：政治職位的封閉程度、政治職位的競爭程度、政治職位的開放程度、行政首長的獨立程度、政治組織的權限，以及社會大眾政治發言管道的完善程度等。^⑯

學者專家對於民主條件的論述，雖以不同層面進行分析，但彼此之間存在著一個最大公約數，即對「自由」(freedom) 的保障。著名的非營利研究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就將自由視為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⑰至於選舉民主與自由民主孰先孰後的問題，學者之間頗有爭論。Michael Saward 認為，選舉民主與自由民主經常同時發生，實屬一體之兩面。^⑱而 Russell Bova 則以為，選舉民主應先於自由民主；因此，選舉民主為保障自由民主的先決條件。^⑲

二、政黨輪替與民主政治

根據自由之家的評估資料，全球的民主與自由度於 1989 年開始急速朝向「自由」狀態發展。很明顯地，這種發展趨勢與共產世界在 1980 年代後期的崩潰有直接關連。當時，由人民選舉產生政治領袖的選舉民主國家體制，取代了共產世界專制統治的政治體制；新政權成立後則透過法令的修正，保障社會的公民自由。而部分「第三波民主」(the third wave) 下的發展中國家，如台灣、南韓則是順著這股潮流，一方面擴大人民政治參與的權利，另一方面則逐步解除對公民自由的管制。^⑳

在這波民主化的潮流中，民主儼然成為涵蓋自由、平等乃至於和平概念的普世價值。Francis Fukuyama 甚至認為，民主自由的普及將為人類社會帶來無限期的和平與安

註⑭ 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p. 221~222.

註⑮ Ted Gurr,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Political Systems 1800-197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68 (1974), pp. 1482~1504.

註⑯ Polity Project 自 1974 年發展至今，已邁入第四代 (Polity Project IV)。前三代的資料，目前收錄於美國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 ICPSR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資料庫。而第四代的資料則可於網站上公開查閱，網址為 <http://www.cidcm.umd.edu/inscr/polity/>

註⑰ 藤原郁郎，「民主化指標の考察と検証－識字率との相関分析を通じて」，*國際關係論集*，第 4 期 (2004 年)，頁 73~74。

註⑱ Michael Saward, "Democratic Theory and Indices of Democratization," in David Beetham (ed.), *Defining and Measuring Democracy* (London: SAGE, 1994), pp. 6~24.

註⑲ Russell Bova, "Democracy and Liberty: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63~77.

註⑳ 「第三波民主」(the third wave) 是 Samuel P. Huntington 於 1991 年提出的概念。Huntington 認為，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所帶動的民主化浪潮，是第一波民主 (1828-1926 年)；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改革，是第二波民主 (1943-1962 年)；從 1974 年葡萄牙政變所引起全球規模的政治變革，則是第三波民主 (1974 年至今)。參照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op. cit.*

定；導致安定體制崩壞的戰爭將不再發生，世界的歷史發展已到達最終階段。^①與此同時，關於民主條件的論述，也因應 1990 年代初期的民主化潮流，開始了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學者有鑑於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轉換期間，因一黨獨大的體制而出現專制傾向，過去由多人或多個政黨共同分享權力的多元政體形態已然不足以實踐民主的價值，而應以「政黨輪替」與否來評估各國的民主政治。例如，James Lee Ray 主張，對於民主的定義要求必須至少有一次真實的政黨輪替。這項指標排除了一些長期以來被視為民主政體的國家，如 1800 年之前的美國與 1979 年之前的印度。^②山口二郎則認為日本政治近似於「多元政體」，是自民黨一黨獨大體制下，權力、利益由多人共享的多元民主主義，需要透過政黨輪替消除其所帶來的政治閉塞現象，以完善真正的民主主義。^③Huntington 與 Leslie Lipson 則是更進一步，強調國家的民主政治成熟度，端視其政權是否由兩個以上的政黨輪流執政。^④易言之，成熟的民主國家，必須歷經兩次以上的政黨輪替。

如前所述，政黨輪替是統治權力在不同政黨間進行執政轉換的過程與結果。在政黨輪替的過程中，必定涉及到政治權力的更迭，因此有的時候也被稱之為「政權輪替」。一般而言，政黨輪替具有促進政治民主化的作用，可紓解一黨獨大所造成的貪污腐敗、行政不中立等嚴重弊端；一個國家若無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或長期未曾出現政黨輪替，則可以斷言，其民主政治必然未上軌道。^⑤政黨輪替雖為民主政治的重要條件，但政黨輪替的實現，本身也需要政治、經濟、社會與政黨條件的支持，說明如下：

（一）在政治方面，前述的政治領袖由人民選出、自由公正的普選制度、意見表達的自由等，依然是政黨輪替實踐的民主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完全的政黨輪替在政治上尚有一必要條件，即該國必須有兩個以上實力相當的政黨存在，如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英國的工黨與保守黨，以及台灣的民主進步黨與中國國民黨。在多黨制國家或地區，常會出現部分政黨退出聯合政權，而由其他在野政黨取而代之，重新分配行政權力的情形，此時的輪替狀態，比較接近政治權力輪替，而非完全的政黨輪替。

（二）在經濟方面，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相對穩定，以中產階級為社會中間力量的國家，較易實現政黨輪替。Barrington Moore 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進程時，主張獨立而強大的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出現的必要條件。^⑥而中產階級在民主政治中的重

註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註② James Lee Ray, *op. cit.*, p. 100.

註③ 山口二郎，前揭書，頁 204~207。

註④ 參照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op. cit.* 與 Leslie Lipson, *The Great Issues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10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7).

註⑤ 許志雄，「政黨輪替在我國憲政發展上的意義—從統治機構論的角度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61 期（2000 年），頁 26。

註⑥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67).

要性，不僅存在於民主轉型階段，也是民主鞏固階段的重要力量。^⑳中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的薰陶下，偏好自由而公平的競爭體制；一旦政府的政策措施違反了平等公平的原則，中產階級不會選擇戰爭、革命的手段，而是期盼由另一個政黨來重新恢復平等公平的原則。^㉑

(三) 在社會方面，社會中的政黨輪替氛圍，亦是政黨輪替實現與否的重要條件。一般而言，社會的政黨輪替氛圍，受到國內外環境因素的雙重影響。其中，國內環境因素與前述的政治、經濟條件相關，表現在社會成員的政治參與度與投票傾向；國外環境則與該社會所面臨之國際情勢與潮流息息相關。舉例來說，身處相對和平穩定的國際局勢，受到外來民主化潮流的影響，且社會成員有高度政治參與熱誠的國家，較易出現政黨輪替的氛圍。

(四) 在政黨理念方面，政黨輪替的另一項條件是，在野政黨必須提出「務實的」，亦即符合社會多數人期待的政策方針，方能順利實現政黨輪替。^㉒例如，西德社會民主黨於 1959 年公布〈Bad Godesberg Program〉，重新闡述民主社會主義的價值；除了承認資本主義民主的基本架構與價值外，也肯定複數政黨體制，並明確保證政黨再輪替的可能性，以消除社會主義政黨的激進色彩，化解民眾對社會主義政黨的疑慮。^㉓而臺灣的民主進步黨於 1999 年公布的〈臺灣前途決議文〉，對於臺灣政黨輪替的實現，也發揮關鍵性的效果。

綜上所述，政黨輪替的實現與否，可從一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政黨條件看出端倪，這亦是本論文進行日本政黨輪替思維分析的出發點。對民主國家而言，不管其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如何，政黨輪替的實現最終是選民在投票時的政治判斷，是其政治思考與政治思維的結果；而受到政黨輪替思維影響而產出的政治結果，又形成新的內外環境因素，成為新一輪政治判斷的素材。雖然決定論 (determinism) 者認為，在缺乏正確資料與可靠方法的情況下，人類的行動和選擇是完全受制於外在的因素。^㉔但以計量數據對於日本政治意識進行描述說明與分析判斷，已被日本的政治學者認為是一可行之道。^㉕可惜的是，多數日本政治意識的研究，均將分析焦點放在日本國民的生活意識、國家觀念、社會構造、政黨支持傾向與無黨派層與選舉結果的關聯，較少以宏

註⑳ 渡辺洋三，*日本社会はどこへ行く：批判的考察*（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

註㉑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對此提出不同意見。如 Huntington 發現，由於中產階級具有維持現狀的保守性格，在民主轉型階段，為了鞏固其社經地位，不但沒有成為推動民主的力量，反而變成阻礙民主化的保守勢力。見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註㉒ 許志雄，前揭書，頁 26。

註㉓ 樋口陽一，*比較のなかの日本國憲法*（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頁 9。

註㉔ B. F. Skinner, *Verbal Behavior of Organism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38)。

註㉕ 可參考京極純一，*政治意識の分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上條末夫，*政治意識の構造*（東京：北樹出版，1978年）；小林良彰、村山皓司、谷藤悦史、武重雅文，*現代政治意識論－アノミー・疎外・政治不信の構図－*（東京：高文堂出版社，1984年）；三宅一郎，*政党支持の分析*（東京：創文社，1985年）。

觀的角度解釋日本政黨輪替意識的變化。有鑑於此，本文乃以日本內外環境的變化作為解釋變項，以政黨輪替思維作為中介變項，試圖對戰後日本何以遲遲無法出現政黨輪替的政治發展狀態，進行總體性的分析與說明。作為中介變項的政黨輪替思維，如前所述，乃是日本民眾在內外環境影響下的政治態度與政治判斷，而以政黨支持態度呈現。在上述的理論脈絡下，本論文的分析架構整理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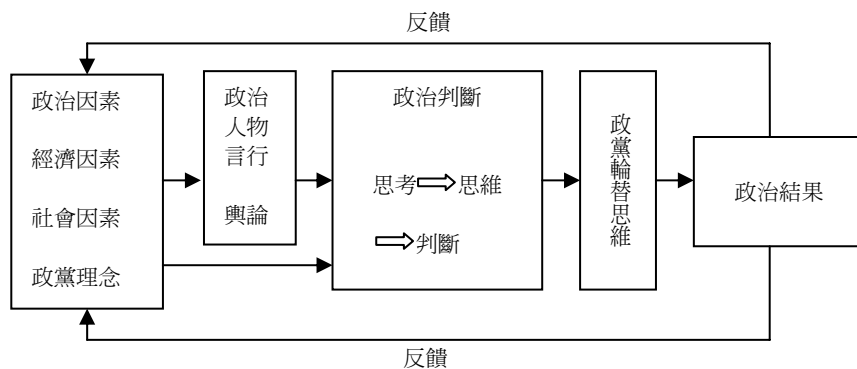


圖 1 政黨輪替思維研究分析架構圖

參、日本政黨輪替思維的演變

一、憲政常道與政黨輪替

「憲政常道」(common practice of the constitution) 為一日本政治術語，指的是：「憲法政治的正常軌道，必須由人民經由普通選舉而產生的代議士(議員)所組成的議會來決定政府政策的政治。政府必須是在議會裡握有多數議席之政黨首領出來組閣，而天皇的任命不過是形式上的例行手續」。^④此一政治術語源自於日本大正後期(1920年代)，由深受民主主義思想與英國議會內閣制精神的議員與學者，針對《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未竟之處所提出的。由於《大日本帝國憲法》只有在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由國務大臣輔弼天皇，並無明定內閣及內閣總理的相關職務。而內閣的運作乃依據 1885 年的《內閣職權》(全七條)，以及 1889 年公布的《內閣官制》(全十條)，將內閣總理(首相)視為同輩閣員之首席，統領政務。然而，日本自 1885 年 12 月 22 日由伊藤博文擔任首相組成第一屆內閣之後，內閣總理按慣例是由擔任過首相的元老、元勳議商後，奏薦天皇任命之。直到「大正民主時期」(1912 至 1926 年)，民主自由的思潮席捲日本社會，在民意所趨之下，「由國會第一大黨黨主席出任首相」的民主政黨政治開始受到矚目。

1918 年，元老山縣有朋奏薦國會第一大黨的立憲政友會黨主席原敬出任首相一

註④ 傅正主編，雷震著，雷震全集，第 9 冊(台北：桂冠出版社，1989 年)，頁 116。

職，被視為近代日本第一次政黨內閣的實現。然而，原敬出任首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元老們屬意其平民身分，可安撫當時因米價高漲所引起的社會民心動盪。事實上，平民出身的原敬擔任首相，受到當時日本民眾的高度擁戴，並稱其為「平民宰相」。原敬雖以立憲政友會黨主席的身分出任日本首相，但其實現非肇因眾議院總選舉的結果，因此不應視為真正的政黨內閣。原敬於 1921 年被右翼分子暗殺後，貴族與官僚再度掌控組閣權。其後的加藤友三郎內閣（1922 年 6 月 12 日至 1923 年 9 月 2 日）、第二次山本權兵衛內閣（1923 年 9 月 2 日至 1924 年 1 月 7 日）與清浦奎吾內閣（1924 年 1 月 7 日至 1924 年 6 月 11 日），均非政黨內閣。當時，日本民眾要求恢復政黨內閣的呼聲，與政黨力量相結合，最終形成「第二次護憲運動」，並於 1924 年 5 月的第 15 屆眾議院總選舉後，由第一大黨憲政會黨主席加藤高明，組成政黨內閣。

加藤高明內閣的成立，開啓了近代日本政黨政治的第一個高峰期，而其實際運作，也形成日本的「憲政常道」。其後的第一次若槻禮次郎內閣、田中義一內閣、濱口雄幸內閣、第二次若槻禮次郎內閣與犬養毅內閣，均屬於政黨內閣（參照表 1）。

表 1 日本的政黨內閣（1924-1932 年）

內閣	在任時間	政黨	內閣總辭理由
加藤高明內閣	1924 年 6 月 11 日至 1926 年 1 月 30 日	憲政會 (立憲民政黨前身)	首相病逝
第一次若槻禮次郎內閣	1926 年 1 月 30 日至 1927 年 4 月 20 日	憲政會 (立憲民政黨前身)	昭和金融恐慌事件
田中義一內閣	1927 年 4 月 20 日至 1929 年 7 月 2 日	立憲政友會	皇姑屯事件 (關東軍刺殺張作霖)
濱口雄幸內閣	1929 年 7 月 2 日至 1931 年 4 月 14 日	立憲政友會	首相身體不適
第二次若槻禮次郎內閣	1931 年 4 月 14 日至 1931 年 12 月 13 日	立憲民政會	九一八事變
犬養毅內閣	1931 年 12 月 13 日至 1932 年 5 月 26 日	立憲政友會	首相遭刺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當時的憲政常道，是以下述方式呈現：

- (一) 由元老、元勳奏薦後，天皇任命眾議院第一大黨黨主席出任日本首相。
- (二) 當內閣因不可抗力（如首相死亡）而被迫總辭時，續由執政黨推出新黨主席重新組閣。
- (三) 當內閣因政治責任而被迫總辭職時，由元老、元勳奏薦後，天皇任命眾議院第二大黨黨主席出任日本首相。
- (四) 第二大黨黨主席就任內閣總理後，為強化內閣的民意基礎，應在短期內解散眾議院重新進行總選舉。

近代日本政黨內閣的發展，隨著軍部勢力的急速攀升，於 1932 年劃下句點。若按當時的憲政常道，接任犬養毅擔任首相者應為鈴木喜三郎，但元老西園寺公望奏薦的

人選卻是原海軍大臣齋藤實；齋藤實內閣的成立，打破憲政之常道，也終結了日本的政黨內閣。^④

日本憲政常道之核心價值在於：以民主代議與政黨輪替的慣例，來完備《大日本帝國憲法》的自由民主精神。在當時軍國主義盛行的時代，可以從下列兩個層面觀察日本憲政常道的意義：第一，憲政常道不僅是一種向人民訴求政治責任與政治道德的理念，也是一套付諸實行的「非正式制約」(informal rule)；第二，在憲政常道下，執政黨與在野黨缺乏彼此合作的動機。前者可視為藉由輿論政治形式，啓蒙日本民眾以對抗國家主義；^⑤後者則以為憲政常道的政黨政治機制，迫使第一大黨與第二大黨之間進行激烈競爭，以致無法在制度上聯合對抗急遽擴大的軍部勢力。^⑥

此一憲政常道實際付諸實行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的八年，但其精神已深入日本社會，成為戰後初期日本政治學家、政治菁英與一般大眾對日本民主主義認知的主要來源，並具體影響當時的政治局勢。^⑦舉例來說，1947 年日本舉行戰後新憲法《日本國憲法》精神下的第一次眾議院選舉（第 23 屆眾議院議員總選舉）。在 466 個席次中，日本社會黨獲得 143 席，日本自由黨獲得 131 席，民主黨獲得 124 席。^⑧執政的日本自由黨大敗，淪為在野黨；而以日本社會黨、民主黨為主的在野陣營大勝，社會黨的片山哲取代自由黨的吉田茂，成為日本第 46 任首相，這是戰後日本第一次的政黨輪替。^⑨值得一提的是，在憲政常道的精神下，片山哲在國會的「首班指名選舉」（即「首相指名選舉」）中，幾乎獲得全體議員的一致通過（419 比 1），遠超過執政黨的議席數。

若以前述之政黨輪替條件為分析架構，對憲政常道時期的日本政治進行分析時可以發現，在政治條件方面，此一時期日本雖尚未實行普選制度（只有年滿 25 歲的男子擁有選舉權），也無完全的意見表達自由，但存在兩個實力相當的政黨（立憲政友會與立憲民政黨）。在經濟條件方面，1920 年代的日本尚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追求穩定的中產階級尚未形成；在社會條件方面，此時的日本社會一方面受到大正民主運動的影響，民眾對於政治權利的要求日益殷切；另一方面，關東大地震（1923

註④ 百瀨孝，*事典 昭和戰前期の日本—制度と実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0 年），頁 19。

註⑤ 參見片山慶隆，「陸羯南研究の現状と課題」，*一橋法學*，第 6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377。

註⑥ 阿部弘臣，「民主政治の失敗—戦前期日本の政党政治に関するゲーム論的考察—」，*相關社会科学*，第 18 号（2008 年 4 月），頁 2。

註⑦ 包括美濃部達吉、吉野作造與宮澤俊義在內的著名政治學者，均認為憲政的常道是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發展的重要精神。參見高見勝利，「戰後民主主義とその作法：社会啓蒙家としての宮沢俊義」，*法政研究*，第 54 卷第 2-4 合併號（1988 年 3 月），頁 387~422。

註⑧ 目前日本所實施的《日本國憲法》於 1946 年 11 月公布，1947 年 5 月 3 日實施。在新憲法正式實施之前的 4 月 25 日，日本國內即舉行了第 23 屆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此次選舉雖在新憲法正式實施前舉行，但實質的選舉制度運作則符合新憲法的精神。

註⑨ 此處所指稱的「民主黨」，是 1947 年由當時日本進步黨的保守政治人物，以及自由黨內反對吉田茂的黨員所組成。該黨於 1950 年 4 月解散，與本文所欲探究的「民主黨」為截然不同的政黨。

年)與昭和金融危機(1927年)的發生,為日本社會帶來動盪與不安。即便如此,在軍國主義色彩濃厚的1920年代,為了國家的發展與國體的維持,日本民眾仍安於現狀。^⑤在政黨條件方面,1927年成立的立憲民政黨,主張「議會中心主義」,以伸張國際正義、消除社會差距以及擁護國民自由為黨綱,獲得布爾喬亞(bourgeoisie)階級的支持;而1900年成立的立憲政友會,為親近軍部的保守派政黨,反對歐美國家盛行的議會中心主義,其主要支持群眾為地主階級。雖然日本在憲政常道時期多次歷經政黨輪替,但由於民主的基礎條件不足,經濟與社會動盪不安,最終由軍部勢力主導日本政治,短暫的民主政黨輪替時期於1932年宣告結束。

二、戰後日本的政黨輪替思維

1947年11月公布的《日本國憲法》,廢除《大日本帝國憲法》中天皇任命首相與國務大臣的絕對權力,將行政權歸於內閣(憲法第六十五條)。而首相的決定,則為國會最優先之議案(憲法第六十七條),須有國會三分之一以上議員出席,出席議員二分之一以上的同意(憲法第五十六條)。易言之,由眾議院總選舉的結果決定政權之歸屬,已由舊憲法時期的慣例,變成新憲法時期的制度。至此,政黨內閣之憲政常道精神,隨著新憲法的實施,成為二次戰後日本民主政治的關鍵機制。而1947年的第23屆眾議院議員總選舉的結果,則促成二次戰後日本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然而,社會黨出身的片山哲,過度憧憬社會主義理論的國有化與國家管理政策,招致民眾的不滿與黨內的反彈,片山哲內閣於1948年3月被迫總辭。此時,對於繼任首相的人選,執政黨與在野黨有激烈爭議。執政黨將這次總辭的原因定位為黨內事件,認為由同屬執政陣營的芦田均(民主黨黨主席)出任首相是理所當然的;而在野黨的吉田茂(日本自由黨)則主張,芦田均內閣的成立是違反民主精神的行徑,應依照憲政常道的精神,由第二大黨組閣。另一方面,主導戰後初期日本民主化進程的「聯合國佔領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GHQ)下轄之「民政局」(Government Section),對右派保守的吉田茂抱持疑慮,支持芦田均內閣的正當性,並於1947年2月24日發表〈人民的支配〉聲明,主張執政黨自發性的內閣總辭,不須依循憲政常道由國會第二大黨組閣;同時批判日本自由黨的見解是曲解民主主義,違反人民意志的思維。^⑥芦田均的組閣行動雖然受到在野黨以及輿論媒體的猛烈批判,

註⑤ 1920年代中期,隨著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等君主制國家的解體,大日本帝國一方面以《治安維持法》(1925年4月22日公布)取締反對天皇制、私有財產制的運動,另一方面則以成年男子普選制度(1925年5月5日公布)來緩和民眾的不滿。在成年男子普選制度之下,當時的日本選民人數從307萬人(約占總人口數的5.5%),激增至1240萬人(約占總人口數的20.1%),成為維繫當時大日本帝國國體與政治體制存續的重要支持力量。見鶴飼信成、福島正夫編,講座・日本近代發達史4(東京:勁草書房,1980年)。

註⑥ 福永文夫,占領下中道政權の形成と崩壊—GHQ民政局と日本社会党(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

但在民政局的全力支持下，仍於 1948 年 3 月 10 日順利成立。^⑤值得一提的是，憲政常道中的政黨內閣慣例雖受到新憲法的保障，但第二大黨組閣的慣例，在前述民政局與芦田均內閣的解釋下，被視為違反民主精神的過時慣例。這項新解釋原本是防止自由黨執政的說詞，但日後卻成為自民黨對抗在野黨要求政黨輪替的藉口：即自民黨的內閣總辭，均為黨內自發性的內閣總辭。自此，日本政黨輪替思維中，傳統的憲政常道精神開始淡化；此一改變雖然是政治菁英在權力考量下的政治判斷，但同時也反映了日本戰後以「否定戰時體制」為基礎的政治思維。^⑥

1949 年 1 月 23 日的第 24 屆眾議院議員總選舉中，在野的自由黨與執政陣營的民主黨部分議員組成「民主自由黨」，在選舉中單獨過半，吉田茂再度回任首相。本次選舉中，保守派勢力（右派）與革新派勢力（左派）的得票比率約為二比一，中間政黨的得票比率極低，而社會輿論也出現左右分極化的現象。日本政黨雖在 1950 年代歷經多次合縱連橫，也於 1955 年形成以自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但這種投票支持傾向一直沒有出現重大變化。日本自民黨於 1955 年開始的一黨獨大體制，一般稱之為「五五年體制」（Parties System Since 1955）。^⑦五五年體制的重要特徵之一為：以自民黨為首的保守派勢力居國會穩定多數（議席數超過二分之一，但低於三分之二），而以社會黨為首的革新派勢力則靠超過三分之一的議席數，牽制保守派勢力修改和平憲法的行動。^⑧在五五年體制下，政黨分立的情勢相當明顯，但在野黨與執政黨的勢力懸殊，以致無法達到政黨輪替的政治必要條件，即必須有兩個以上實力相當的政黨存在。在國內外環境的交互影響下，五五年體制下的日本政治構圖，既非勢均力敵的兩黨制，也非相互合縱連橫的多黨制，而是立場對立但勢力懸殊的「一又二分之一政黨制」。

一般研究多認為，SNTV 的實施是形成上述「一又二分之一政黨制」的主要制度因素。但誠如 Douglas W. Rae 所言，政黨體系受到社會、經濟、法律與政治等諸多變數的影響，選舉因素只是眾多決定力量之一。^⑨事實上，受到國內外各種社會、經濟、法律與政治變數影響下的日本選民投票傾向，才是形成五五年體制的唯一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與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對此，部分學者認為，1950 年代日本國內的政治發展，受到國際冷戰情勢的影響，形成「國內冷戰」的政治構圖。此一國內冷戰，不是以「共產主義」與「反共產主義」為對抗主軸，而是呈現在

註⑤ 岸本弘一，*国会議事堂は何を見たか—議会政治・激動の半世紀*（東京：PHP 研究所，1986 年）。

註⑥ 雖然有政治學者在戰後大力倡導憲政常道的重要性，但丸山眞男認為日本戰後的民主思潮，是以「反對戰時體制」為出發點，並以「愛國」的形式呈現。見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國」—戰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 年），頁 67-69。

註⑦ 「五五年體制」一詞源自日本政治學者升味準之輔於 1964 年發表的論文。參見升味準之輔，「1955 年の政治体制」，*思想*，第 480 号（1964 年 6 月），頁 759-776。

註⑧ 曹瑞泰，「冷戰後的日本政黨政治」，*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11 期（1997 年 11 月），頁 28。

註⑨ Douglas W. Ra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41.

「保守」與「革新」的對立上。^{⑤⑦}在國內冷戰的政治構圖下，立場保守的自民黨與主張革新的社會黨，雖然在政治立場上多次出現激烈爭辯，也各自訴諸選民的支持，但保守政黨與革新政黨的政治版圖，卻未出現重大變化。這亦顯示出，日本民眾在國內冷戰的情勢下，對於穩定政治的要求大於對政黨輪替的追求。^{⑤⑧}川島高峰則指出，在國內冷戰的情勢下，日本民眾傾向思想上的保守反動與言論上的自我限制。^{⑤⑨}如圖 2 與圖 3 所示，日本民眾雖然對自民黨的歷任內閣感到不滿，但在歷年的調查資料中，第一大黨自民黨的支持度與第二大黨社會黨之間，依舊維持極大的差距。

日本社會黨認知到，在此一保守思維與穩定的政治構圖下，議會路線最終只能停留在修憲與護憲的議題上。再加上自民黨始終堅稱其內閣總辭均為黨內自發性的行為，若要實現社會黨主導的政黨輪替，只能走激進革命路線。自 1960 年代起，日本社會黨開始以「護憲反安保」的口號，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街頭抗爭運動，但始終無法得到日本多數民眾的響應。社會黨的激進革命行動，不但無法動搖自民黨的統治基礎，反而使其支持群眾日漸減少。^{⑥⑩}

到了 1990 年代初期，隨著國際冷戰的結束，日本國內的政治構圖也產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改變是，在野黨不再堅持「護憲政黨」的基本主張，在憲法第九條和平主義的問題上，改採「務實」的立場，因而於 1993 年實現政治權力輪替。^{⑥⑪}執政的自民黨在外有泡沫經濟危機，內有派系內訌、醜聞纏身的雙重影響下，於 1993 年交出長達 38 年的政權；由新生黨小澤一郎主導在野黨聯盟，推舉日本新黨黨主席細川護熙擔任「連立政權」的首相。1993 年 7 月的這場選舉（第 40 屆眾議院議員總選舉），在表面上終結了五五年體制，實現了政黨輪替。但若排除脫黨、倒戈的原自民黨議員，由自民黨所代表的保守派勢力與革新派勢力的比率依舊是二比一。以得票率來看，自民黨為 36.62%，脫離自民黨而自立的日本新黨、新生黨與新黨先驅，分別為 8.05%、10.10%與 2.64%，再加上中道偏右的公明黨（8.14%），合計 65.55%。日本社會黨、民社黨、日本共產黨等革新勢力的得票率合計 34.45%（參照表 3）。在選民結構並無太大變化的情況下，連立政權的基礎極為薄弱，細川護熙（263 日）與接任的羽田孜（64 日），擔任首相的任期合計只有十一個月。

註⑤⑦ 參照加藤秀治郎，*憲法改革の政治学*（東京：一藝社，2005 年），頁 109。而松岡完、広瀬佳一與竹中佳彦等人也提出類似的主張，見松岡完、広瀬佳一、竹中佳彦，*冷戦史：その起源・展開・終焉と日本*（東京：同文館出版，2003 年）。

註⑤⑧ 佐藤誠三郎與松崎哲夫認為，導致自民黨的一黨長期執政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在農村地區形塑其意識形態的穩定基礎；二是藉由經濟政策來訴求經濟生活的穩定。穩定的思維使得大多數日本人民不願意支持在野黨與選擇政黨輪替。見佐藤誠三郎、松崎哲夫，*自民党政権*（東京：中央公論出版社，1986 年）。

註⑤⑨ 川島高峰，「戦後の終焉と冷戦後責任－歴史認識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政経論叢*，第 68 卷第 2・3 號（1999 年），頁 1~30。

註⑥⑩ 當時對日本社會黨激進革命行動抱持疑慮的支持群眾，日後多轉向支持中道偏右的公明黨與穩健左派的日本共產黨。社會黨的眾議院議員席次，從 166 席（1958 年）、145 席（1960 年）、144 席（1963 年）、140 席（1967 年）到 90 席（1969 年），逐年遞減。

註⑥⑪ 樋口陽一，*轉換期の憲法*（東京：敬文堂，1996 年），頁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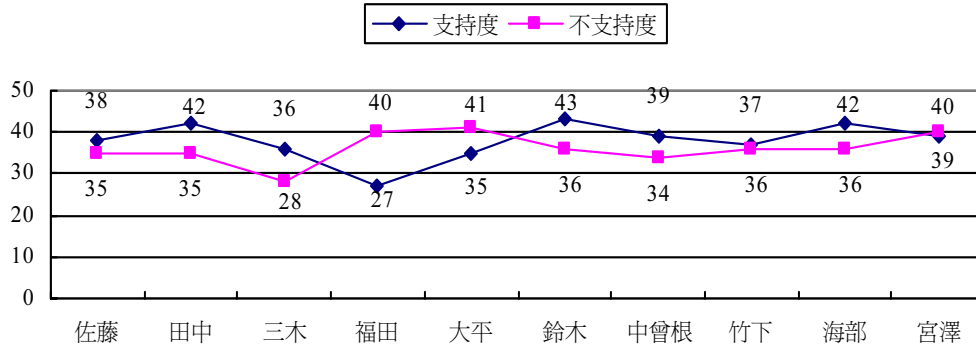


圖 2 五五年體制下自民黨內閣支持度的變遷 (1964-1992 年)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社全國世論調查資料。轉引自金正俊，「政党支持率の変遷：朝日新聞社全國世論調査から」，日本世論調査協会報，第 70 號 (1992 年 10 月)，頁 63。

註：各內閣的支持度與不支持度為歷年調查資料的平均值。包括佐藤榮作 (1964-71)、田中角榮 (1972-73)、三木武夫 (1974-75)、福田赳夫 (1977)、大平正芳 (1978-79)、鈴木善幸 (1980-81)、中曾根康弘 (1982-86)、竹下登 (1987-88)、海部俊樹 (1989-90)、宮澤喜一 (1991-92)。宇野宗佑 (1989) 因在任時間未滿三個月，不在內閣年度支持度調查的對象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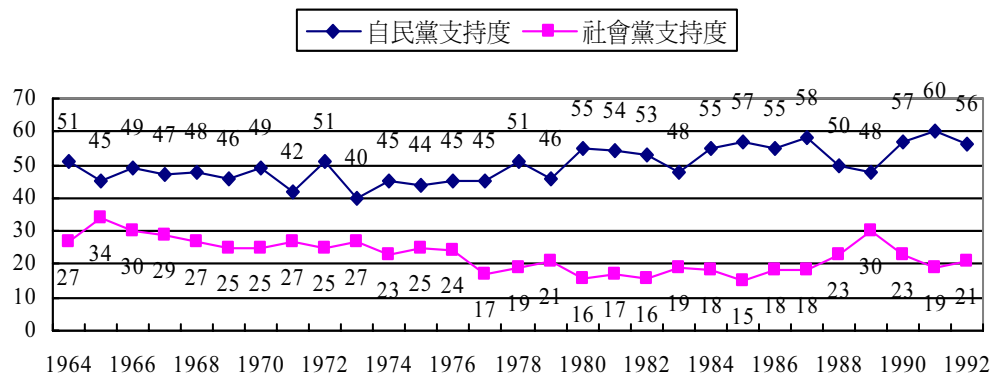


圖 3 五五年體制下自民黨與社會黨支持度的變遷 (1964-1992 年)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社全國世論調查資料。轉引自金正俊，前揭書，頁 63。

表 2 五五年體制下的政黨輪替條件分析

政治條件	1. 實施完全普通選舉 (1945 年)，年滿 20 歲的男女皆有選舉權。 2. 實施新憲法 (1947 年)，保障人民的權利與自由。 3. 「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制度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簡稱 SNTV) 的實施。 4. 自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
經濟條件	歷經戰後復興與經濟起飛階段，中產階級人口快速增加。
社會條件	在國際與國內冷戰的情勢下，日本民眾對於穩定政治的要求大於對政黨輪替的追求。
政黨條件	日本在野黨採取激進革命行動路線，不符日本人民之期待。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3 第 40 屆眾議院議員總選舉得票率比較

保守勢力得票率		革新勢力得票率	
自由民主黨	36.62%	日本社會黨	15.43%
日本新黨	8.05%	民社黨	3.51%
新生黨	10.10%	日本共產黨	7.70%
新黨先驅	2.64%	社會民主連合	0.73%
公明黨	8.14%	無黨籍	6.85%
合計	65.55%	合計	34.45%

資料來源：參照日本總務省自治行政局資料，作者自行整理。

在政治局勢混沌不明的狀況中，失去政權的自民黨拉攏日本社會黨與新黨先驅，組成新連立政權（「自社さ連立政權」），並推舉社會黨黨主席村山富市擔任首相，政治權力再度輪替。^②戰後以來在意識形態上長期對立的「保守自民黨」與「革新社會黨」組成聯合政權，為當時的日本政壇帶來極大的衝擊，部分輿論甚至以「權力分贓」、「世紀野合」等強烈負面詞語加以批評。^③淪為在野聯盟的各政黨領袖，包括鳩山由紀夫、菅直人等人，重新結合反自民黨以及對社會黨轉變感到失望的革新勢力，於 1996 年組成民主黨。2003 年，民主黨與小澤一郎的自由黨合併，日本政治由此形成自民黨與民主黨競爭的兩黨政治形態。在 2003 年的第 43 屆眾議院總選舉中，執政的自民黨（237 席）、公民黨（34 席）與保守新黨（4 席）共獲得 275 席；而以民主黨為主的在野陣營，只獲得 194 席。但就得票率來說，在野陣營獲得 48.66% 選民的支持，執政聯盟則為 46.67%（無黨派的支持度為 4.67%）。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日本 NHK 在選前所做的調查顯示，當時已有 69% 的受訪者在選前表態支持兩黨制的政治體制。^④民主黨雖然在議席的爭奪上敗下陣來，但也對於投票的結果感到振奮，認為「實質」政黨輪替的條件已然成熟。^⑤

三、日本政黨輪替思維轉變的關鍵因素

日本社會的政黨輪替思維，何以在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轉變？就政治層面而言，日本人民的意見表達自由以及選舉的權利，自 1946 年的新憲法公布實施後，即受到制度性的保障。然而，日本的政治構圖在五五年體制時期，長期處於「一又二分之一政黨制」，也就是半個社會黨與一個自民黨相互對抗的政治體制。由於國內不存在兩

註② 村山富市雖以社會黨黨魁的身分組閣，但在內閣 23 席大臣職位中，社會黨只占 5 席（內閣官房長官、總務廳長官、郵政大臣、勞動大臣、建設大臣），新黨先驅占 2 席（大藏大臣、厚生大臣），其餘的職位均由自民黨議員擔任。因此，在性質上比較接近政權輪替，而非政黨輪替。

註③ 伊藤惇夫，前揭書，頁 29。

註④ 中瀬剛丸、荒牧央、植木宏治，「2 大政党化を志向した有権者：第 43 回衆議院選挙世論調査から」，放送研究と調査，第 54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6-35。

註⑤ 東恭弘，「民主黨の歴史－民主黨の旗揚げ・民主黨と自由黨の合併」，橘民義編著，民主黨 10 年史（東京：第一書林，2008 年），頁 91。

個以上實力相當政黨，因此，即使日本在政治表現上符合大部分的民主指標，但卻缺乏政黨輪替的政治條件。1993 年，日本自民黨的分裂削弱了該黨的實力，也直接導致五五年體制的崩潰；在野陣營經過數年的合縱連橫之後，以「反自民黨」的理念逐漸匯聚成流；而選舉制度的適時改變（由 SNTV 改為「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也使得日本的政治構圖出現轉變，朝向兩黨制發展。

就經濟層面而言，日本戰後經濟的蓬勃發展，讓日本在短時間內走出戰爭所導致的民生破敗。到了 1960 年，池田勇人內閣提出「所得倍增計畫」，使日本的國民所得在 7 年之內倍增；而伴隨著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日本國民的生活水準大幅提升，也創造出大量的中產階級。1980 年代以後，多數日本國民開始意識到其在現代社會結構中的「中流地位」，大眾媒體亦習以為常地以「一億總中流」來描述日本社會。所謂的「一億總中流」，是將日本 1 億 2700 萬人口，全都歸類為「中產階級」。「一億總中流」的論述雖有過於武斷之處，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描繪出當時日本社會的狀態。事實上，根據日本內閣府歷年的〈国民生活に関する世論調査〉（關於國民生活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自己的生活處於社會下層者從未超過 10%，這個數字自 1990 年之後，更低於 7%；而認為自己的生活處於社會上層者，從未超過 1%。易言之，有百分之九十的日本人認為，自己的生活處於社會中層，也就是屬於中產階級。超過 1 億人的日本中產階級，雖然未主動進行政黨輪替的推動，但在日本政治構圖發生變化的 1990 年代，卻也助長了政黨輪替的社會氛圍。

就社會層面而言，1990 年代的日本社會，受到國際冷戰的結束以及民主化潮流的影響，自民黨與社會黨因意識形態的對立所形塑的戰後日本政治構造，面臨到變革的壓力。^⑥國際環境的轉變，讓日本的政治人物與部分中產階級的思維，逐漸擺脫冷戰的制約，開始重新思考日本民主的精神。^⑦在內部環境方面，當時的日本經濟面臨戰後以來最大的衰退，執政的自民黨無法適時地體察民意；再加上金錢醜聞層出不窮，黨內派系相互傾軋，日本社會開始瀰漫政黨輪替的氛圍，期盼能有其他有能力、可信任的政黨，帶領日本走出政治與經濟的困境。

就政黨理念層面而言，長期主張以革命手段實現政治改革的日本社會黨，於 1986 年提出〈日本社會黨的新宣言〉，改採民主漸進的方式來達成社會主義的理想。在新宣言中，社會黨不再以「階級的政黨」自居，而是朝向「國民的政黨」。日本社會黨的改變，雖在黨內遭遇左派勢力反彈而導致選舉的失敗，但同時顯示出，即使如社會黨般以理念為主的「使命型政黨」(missionary party)，也面臨到務實化的挑戰。1990 年代中期，日本政治在各新舊政黨的合縱連橫之下，出現了數次政治權力交替的現象；而各政黨為尋求多數選民的支持，無不以務實的政策主張作為政黨理念。以民主黨為

註⑥ 岡田克也，*政權交代—この国を変える*（東京：講談社，2008 年），頁 16-17。

註⑦ 例如，田中直毅就曾指出，國際冷戰結構轉變，促使日本民眾開始注意到自我治理 (self-governance) 的概念，並興起一股自我認識、自我決定以及自我負責的意識。見田中直毅，*日本政治の構想*（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94 年），頁 113-114。

例，其基本理念是「打破舊有體制，創造個性與活力的新社會」；其所追求的目標是「透明公平的社會，公正平等的經濟，公民分權的政府，人權和平的憲法，自力與共生的國家」；而實現理念與目標的手段，則是集結所有可能的政治勢力，同時訴諸於民眾的選擇，實現政黨輪替。^⑧

上述日本政黨輪替思維轉變的因素，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交互影響，相互作用，具體表現在日本無黨派層（independents class）的激增上。如前所述，政黨輪替思維是日本社會成員彼此溝通的結果，也是共同體意識的一種表徵，並以政治人物的言論、公共輿論與民意調查等形式呈現。其中，民意調查經常被使用作為評量人民政治思維轉變的指標；而在政黨輪替思維的分析中，則以政黨支持度的調查為關鍵的評量指標。政黨的支持在人民心理上有兩項意義，一是感情與價值觀層面的意義，屬於「政黨歸屬意識」（party identification）；一是與理解政治現象、獲取政治資訊相關的媒介意義。^⑨

在五五年體制下，不論是在國會議席上還是在政黨支持度調查中，自民黨都處於一黨獨大的態勢。然而，1960 年代以後，日本社會的無黨派層開始增加，1967 年首度突破 10%，1976 年達到 20%；在五五年體制崩壞前夕，日本民眾屬於無黨派者超過 35%，與自民黨的支持度不相上下。^⑩而五五年體制的崩壞，更造成日本政黨的重組與政治的不安，致使日本的無黨派層在短短的一年內急增至 50% 以上。^⑪日本無黨派層增加的原因，在 1980 年代以前，主要是由都市化、經濟發展造成相對剝奪感，以及對社會主義的失望所致。其中，都市化是一種脫離傳統政治地盤的物理性過程，會導致政治的浮動，並帶來脫保守化的機會。根據統計，1956 年至 1975 年間，因都市化所造成的日本國內人口移動，總數高達 1 億 4 千萬人次，一方面形成新的社會網絡，另一方面則弱化了日本民眾的黨派性。^⑫而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相對剝奪感，則讓日本民眾對政黨的政策感到失望；根據 1974 年的一份調查顯示，有 9% 的人因為物價膨脹而改變其政黨支持，其中有 5% 從執政黨轉向在野黨，有 4% 從執政黨轉向無黨派。^⑬此外，自 196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捷克布拉格之春以及日本東大安田講堂事件等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經驗，導致日本的左派人士對社會主義的未來感到失

註⑧ 上述民主黨基本理念、目標與理念實現手段的相關論述，載於民主黨於 1998 年 4 月 27 日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的〈私たちの基本理念－自由で安心な社会の実現をめざして〉（我們的基本理念－以實現自由、安心的社會為目標）。詳細內容可參照日本民主黨網站 http://www.dpj.or.jp/policy/rinen_seisaku/index.html。

註⑨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0)。

註⑩ 田中愛治，「選挙・世論の数量分析：無党派層の計量分析」，オペレーションズ・リサーチ：経営の科学，第 43 卷第 7 號（1998 年），頁 370。

註⑪ 參照前田幸男，「時事世論調査に見る政党支持率の推移：1989-2004」，中央調査報，第 564 號（2004 年），頁 3。

註⑫ 三宅一郎，政党支持の分析，頁 24-25。

註⑬ 三宅一郎，政党支持の分析，頁 29-30。

望，也失去對國內社會主義政黨的支持。^④

1980 年以後，里庫路特事件（1988 年）、佐川急便事件（1992 年）等一連串貪污醜聞案的發生，暴露出日本金權政治的本質，更加速了無黨派層的發展。^⑤而日本無黨派層的增加，則被認為是 1990 年代初期瓦解自民黨一黨獨大的關鍵。針對此一時期日本的政局發展與選民態度的變遷，學者曾以定性與定量的研究途徑進行分析。一般的論說均主張，因為日本選民對政治的信賴大幅下降，導致五五年體制的崩壞。然而，善教將太的實證研究發現，並非政治信賴的下降導致五五年體制的崩壞，而是五五年體制的崩壞導致政治信任的下降。^⑥換言之，日本選民對政治的不信任程度，是在五五年體系崩壞後才出現大幅增加的趨勢，也具體表現在當時無黨派層的激增上。這也說明 1990 年代初期的政權輪替，並不是選民的投票選擇，而是政治集團權力重組的結果。關於這些無黨派層的組成，井田正道透過讀賣新聞的民調資料研究發現，從 1990 年到 1995 年的 5 年間，各年齡層的無黨派層均增加 20% 以上，但 30 至 40 歲年齡層的增加幅度為 30%，居所有年齡層之冠。從職業別來看，無黨派層增加幅度較高的職業則為事務技術職與商工服務職（參照表 4）。^⑦值得一提的是，被視為五五年體制主要支持力量的第一級產業（農林漁業）從業者，在五五年體制崩壞後出現「脫政黨化」的趨勢，弱化了自民黨原本的統治基礎；而被認為社會黨支持層的勞務服務從業之「脫政黨化」現象，則直接反映在社會黨的低支持度上。

一般而言，在教育水準持續提高，社會價值觀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下，無黨派層的增加是一般先進國家共通的現象。^⑧這些無黨派層，部分是對政治與政黨感到灰心的政治冷漠者，部分則是無特定政黨歸屬意識者。1990 年代日本的無黨派層大致可分為「流動的自民黨支持者」、「流動的無黨派層」、「堅定的無黨派層」與「堅定的反自民黨者」四類。其中，流動的自民黨者支持主要是那些在政策態度上傾向自民黨者；流動的無黨派層則傾向以議題決定支持的政黨；堅定的無黨派層多期待政治革新與政黨輪替；而堅定的反自民黨者則多為對社會黨失望的原支持者。^⑨三宅一郎在研究日本無黨派層的投票行為時發現，對政黨的印象、政府的態度以及保守革新的意識形

註④ 橋本晃和，*無黨派層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 年），頁 25。

註⑤ 井田正道認為，1990 年代初期（1990-91 年）無黨派層的增加主要來自於對社會黨的失望，具體呈現在社會黨支持度的急遽下滑。1992 年之後，無黨派層的增加則與對自民黨金權政治的不耐有關，也反映在當時宮澤喜一內閣支持度的低迷上。1993 年之後，無黨派急速增加的主因，是來自於對新黨的幻滅。見井田正道，「1990 年代における有権者の変質」，*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紀要*，第 40 卷第 2 期（2002 年 3 月），頁 39-40。

註⑥ 善教將太，「日本における政治的信頼の変動とその要因 1982-2008：定量・定性的アプローチによる『政治』と政治的信頼の因果関係の分析」，*政策科学*，第 17 卷第 1 期（2009 年 10 月），頁 72。

註⑦ 井田正道，前掲書，頁 41。

註⑧ Russell J. Dalton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註⑨ 浦島郁夫，「98 年参院選－自民党はなぜ負けたか」，*レヴァイアサン*，第 25 号（1999 年），頁 78-102。

表 4 年齡別、職業別的無黨派層比例變化 (1990-95 年)

	(A) 1990 年	(B) 1993 年	(C) 1995 年	(B) - (A)	(C) - (B)	(C) - (A)
年齡						
20-29	37.0	54.1	64.0	17.1	9.9	27.0
30-39	29.5	44.2	61.8	14.7	17.6	32.3
40-49	20.1	35.8	50.8	15.7	15.0	30.7
50-59	15.5	28.3	41.2	12.8	12.9	25.7
60-69	15.2	26.7	38.9	11.5	12.2	23.7
70 以上	12.8	23.4	34.3	10.6	10.9	21.5
職業						
農林水產業	11.8	19.2	34.6	7.4	15.4	22.8
商工服務業	16.6	30.7	46.7	14.1	16.0	30.1
自由業	16.3	32.3	43.7	16.0	11.4	27.4
管理專門職	19.5	29.5	46.0	10.0	16.5	26.5
事務技術職	27.4	42.9	58.1	15.5	15.2	30.7
勞務服務職	24.4	37.6	49.1	13.2	11.5	24.7
主婦	24.1	38.8	48.9	14.7	10.1	24.8

資料來源：讀賣新聞社全國世論調查資料。轉引自井田正道，「1990 年代における有権者の変質」，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紀要，第 40 卷第 2 期（2002 年 3 月），頁 41。

態等思維因素，是其進行投票選擇時最重要的考量；不僅影響其政黨立場，也影響其投票意願。⁸⁰另一方面，實證研究也顯示，無黨派層的政治判斷有下述重要特徵：即排斥回頭支持過去的政黨，較易傾向支持新的政黨。這是因為，一般民眾在心理上會對未知的對象給予肯定的評價。⁸¹這也說明，何以 1990 年代初期日本社會黨的政黨輪替口號，無法獲得日本民眾支持；而新成立之民主黨政黨輪替口號，較易獲得日本民眾的青睞。而此一政治思維與社會情勢的轉變，也具體呈現在民主黨的成立與發展上。⁸²

註⁸⁰ 三宅一郎在實證研究中發現，1983 年與 1993 年的調查資料相比較，自民黨支持者的投票意願從過去的 73% 下降到 54%，而無黨派層的投票意願則僅從 38% 降到 32%。若考量日本選民無黨派層的增加比率，可以論斷無黨派層的總投票數是增加的。參照三宅一郎，*選舉制度變革と投票行動*（東京：木鐸社，2001 年），頁 81-82。

註⁸¹ Allyson L. Holbrook, Jon A. Krosnick, Penny S. Visser, Wendi L. Gardner, and John T. Cacioppo, "Attitudes toward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itial Optimism, Inertial First Impressions, and a Focus on Flaw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5, No. 4 (2001), pp. 930-950.

註⁸² 日本社會黨與民主黨政黨輪替思維，都是以取代保守政權自民黨為主要號召，但其所面臨的情勢卻不太相同。日本社會黨提出政黨輪替口號之際，正值歐洲地區興起社會主義政黨取代保守主義政黨的潮流。日本社會黨有意在選舉中，趁勢取代自民黨的保守政權，並於 1989 年第 15 屆參議院選舉中獲得多數黨的地位。然而，日本社會黨採行的中道路線，卻無法獲得日漸擴大的無黨派層之支持，反而逐漸流失其原有的支持群眾，終於在 1996 年宣布解散。而民主黨則以新政黨之姿，高舉政黨輪替的大纛，在日本經濟發展停滯的時代，快速地獲得無黨派層的認同。

肆、民主黨的成立、發展與角色定位

一、選區的改制與民主黨的發展

1993 年成立的細川護熙內閣，任期雖然不到九個月，但在執政期間通過政治改革關連四法案，而其最受到矚目的政績是確立了「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是以單純小選舉區制（first past the post），以及比例代表制同時運作選出眾議院議員 500 名（300 席小選區，200 席比例代表）。2000 年，日本眾議院議員總席次由 500 席降為 480 席，其中 300 席由小選區制選出，剩下的 180 席則由比例代表制選出。新選制下，日本全國劃分為 300 個小選區，每一選區的應選席次為 1 名；比例代表制則劃分為 11 個選區，各選區應選名額不等（6 至 29 人）。每一位選民擁有兩票，以小選區選候選人，比例代表區投票選政黨的兩票制方式進行。前民主黨黨主席岡田克也認為，日本選舉制度改革所造成的影響有四：第一，小選舉區制可減輕候選人的選舉經費壓力；第二，政黨之間政策辯論的重要性大增；第三，可正確反映民意，確立責任政治；第四，形成兩大政黨競爭的態勢，易於實現政黨輪替。^⑳

由於新選制被認為對大黨有利，迫使小政黨之間的合縱連橫日形白熱化。1994 年 11 月，新生黨、公明新黨與日本新黨等小黨決定合併，成立新進黨以因應即將實施的新選制。新進黨的成立，讓其他的新黨先驅、社會黨、共產黨以及無黨籍議員加倍感到壓力，時任新黨先驅黨主席的鳩山由紀夫主張集結自由革新派議員成立新黨，與保守的自民黨、新進黨做出區隔。^㉑1996 年 9 月 28 日，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鳩山邦夫與岡崎トミ子於東京日本青年會館宣告民主黨的成立，黨務與政務分別由鳩山由紀夫與菅直人負責，並由菅直人擔任第一任黨主席。關於「民主黨」的黨名由來，根據鳩山由紀夫的想法，主要是為了對抗自由民主黨（自民黨）推動金融改革時宣傳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以「民主」凸顯自由民主黨只有「新自由」而無「民主」。^㉒

1996 年 10 月 8 日舉行的第 41 屆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是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的第一次適用。民主黨在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區合計推出 169 名候選人，當選 52 席，與選前的議席數相同。當時國會第二大黨的新進黨，則因敗選而激化黨內的鬥爭，黨主席小澤一郎於 1997 年 12 月 27 日宣布政黨解散。原本的新進黨議員紛紛組成各種小黨及次級團體（如國民之聲、新黨友愛），並與國會內的民主黨、太陽黨、From Five、民主改革連合等在野黨組成「民主友愛太陽國民連合」（民友連）。1998 年 1 月，太陽黨、國民之聲與 From Five 合併為民政黨。1998 年 4 月 27 日，為因應同年 7 月的參議院選舉，民主黨、民政黨、新黨友愛與民主改革連合決定合併為單一政黨，並以民主

註⑳ 岡田克也，前揭書，頁 28-29。

註㉑ 板垣英憲，*民主黨派閥抗争史—民主黨の行方*（東京：共榮書房，2008 年），頁 127-128。

註㉒ 鹽田潮，前揭書。

黨為存續政黨，新任黨主席則由舊民主黨黨主席菅直人擔任。菅直人在成立大會上表示：「(民主黨)將以政黨輪替為主軸，將全力結合除自民黨之外的力量」。^⑥此時的民主黨的性質，依舊不脫「反自民黨勢力的集結」，兼容並蓄各種力量，以對抗自民黨。參院選舉的結果，自民黨從選前的 61 席降為 44 席，民主黨則由 18 席增加為 27 席，對轉型不久的新民主黨而言，是個好的開始。

2000 年 6 月 25 日舉行的第 42 屆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是新民主黨面臨的第一場總選舉。民主黨推出 262 名候選人，當選 127 席，比選前增加 32 席。兩次選舉的勝利，主要歸因於對手自民黨的傲慢與失政。在當時選民的認知上，民主黨只是一個由「反自民黨勢力」集結而成的政黨，在內政、外交、國防與憲法等問題上的立場並不明確。^⑦為了向選民宣示民主黨對日本未來的信念，在 2001 年 7 月 29 日的參院選舉，民主黨以「只有政黨輪替，日本才會改變」為選舉標語，首度訴求於選民的政黨輪替思維。在本次選舉中，自民黨在新任首相小泉純一郎的帶領下，表現出新的氣象，民主黨的參議院席次只微增 4 席。另一方面，在「小泉純一郎旋風」的威脅下，新進黨解散後另組自由黨的小澤一郎，與民主黨的菅直人開始尋求兩黨合併的時機。2003 年 7 月 23 日，雙方簽訂《民主·自由兩黨合併合意書》，合併後仍以民主黨為存續政黨，政黨的規約、政策與政權公約 (manifesto) 均沿襲民主黨。同年 9 月，兩黨正式合併，民主黨的黨名雖然不變，但其組成已歷經 1996 年「舊民主黨」、1998 年「新民主黨」與 2003 年「現民主黨」的三次轉變。2003 年 11 月 19 日的眾議院總選舉，合併改組完成的「現民主黨」認為已具備政黨輪替的資格與能力，以「日本的選擇」作為選舉的主軸，極力宣揚政權公約。此時的民主黨已整合在野勢力，成為足以與自民黨對抗的另一政黨。小澤一郎在民主黨與自由黨的合併大會亦宣告：「戰後的日本政治，第一次誕生可取代自民黨政權的在野黨」。^⑧民主黨在此次選舉中推出 277 名候選人，當選 177 席，比選前增加 40 席。

2005 年 9 月 11 日舉行的第 44 屆眾議院總選舉，執政的自民黨在小泉純一郎的帶領下，藉由郵政民營化的議題，在 480 個席次中一舉奪得 296 席，加上友黨公民黨的 31 席，執政黨在日本眾議院中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民主黨雖在選舉前宣示政權公約，打出年金改革的政見，顯示出政黨輪替的企圖，但眾議院席次卻由選舉前的 175 席銳減至 113 席，民主黨黨主席岡田克也為此引咎辭職。然而，新就任的黨主席小澤一郎認為，1996 年成立的民主黨已然成為可與自民黨相抗衡的另一大政黨，日本的民主政治正式邁向兩黨競爭的時代。^⑨兩年後的參議院選舉 (2007 年)，民主黨的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區的得票率分別為 40.45%與 39.48%，遠遠超過自民黨的 31.35%與 28.08%，一躍成為參議院最大黨。至此，民主黨認為政黨輪替已成不可逆的趨勢，一

註⑥ 東恭弘，前揭書，頁 52。

註⑦ 伊藤惇夫，前揭書，頁 136。

註⑧ 板垣英憲，鳩山家の使命－民主党・鳩山由紀夫の夢と構想 (東京：サンガ，2008 年)，頁 141。

註⑨ 小澤一郎，前揭書，頁 247。

表 5 民主黨的競選口號 (1996-2009 年)

選舉名稱	競選口號 (日文)	競選口號 (中文)
第 41 屆眾院總選舉 (1996)	市民が主役の民主党	以市民為主角的民主黨
第 18 屆參院選舉 (1998)	私は変えたい	我要改變
第 42 屆總選舉 (2000)	奪る	奪回
第 19 屆參院選舉 (2001)	日本は、政權交代でしか、 変わらない	只有政黨輪替，日本才會改變
第 43 屆眾院總選舉 (2003)	日本の選択	日本的選擇
第 20 屆參院選舉 (2004)	まっすぐに、ひたむきに	勇往直前
第 44 屆眾院總選舉 (2005)	日本を、あきらめない	永不放棄日本
第 21 屆參院選舉 (2007)	国民の生活が第一	以國民的生活為第一
第 45 屆眾院總選舉 (2009)	政權交代	政黨輪替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方面主張以政黨輪替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則延續勝選效應，要求支持度呈現低迷狀態、不孚人望的自民黨政權解散國會，提前進行眾議院總選舉，以符合日本國民的革新期盼。而朝日新聞歷年的民調結果也顯示，民主黨的支持度在 2002 年之後即逐年上揚，與之相對應的是無黨派階層比率的逐年下降 (參見圖 4)。到了 2008 年，自民黨與民主黨的支持度出現逆轉，民主黨首度成為選民心中的第一大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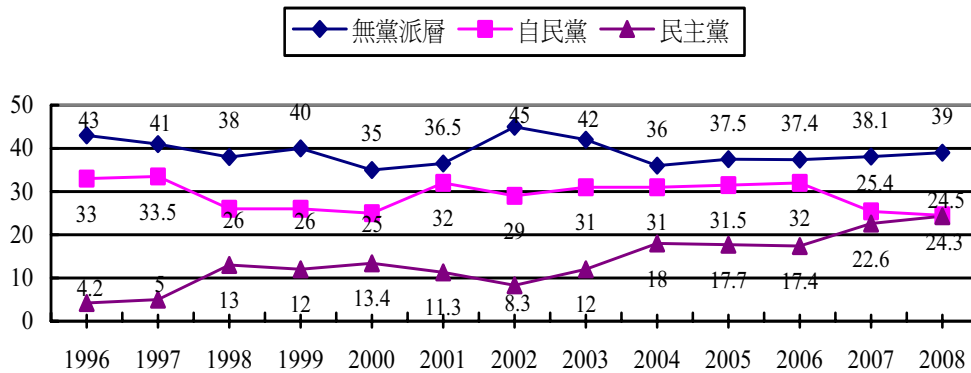


圖 4 日本無黨派層、自民黨與民主黨支持度變遷 (1996-2008 年)

資料來源：參照朝日新聞歷年的民意調查，作者自行繪製。

2009 年 7 月 13 日，在歷經多次地方選舉與東京都議會選舉的挫敗後，麻生太郎與黨內派閥幹部及結盟的公明黨會商後，宣布將於 7 月 21 日解散眾議院，並於 8 月 30 日進行總選舉。另一方面，日本民眾的政黨輪替思維，也隨著民主黨支持度的上升而日趨高揚。例如，在朝日新聞的民意調查中 (2009 年 6 月 13-14 日)，有 52% 的受訪者期盼民主黨執政，期盼自民黨繼續執政的只有 23%。除了一般民眾之外，日本的企業也抱持相同的態度。根據日本研究機構「帝國 Data Bank」(TDB) 在 2008 年 9 月的調查，在有效回答的 1 萬 708 家受訪企業中，有 5164 家企業認為有必要進行政黨

輪替，占全體受訪企業的 48.2%；認為沒有必要進行政黨輪替的企業為 2618 家，占全體的 24.4%。^⑩也就說，贊成政黨輪替的企業是反對者的兩倍，與一般日本民眾的政黨輪替思維相當。對民主黨而言，8 月 30 日的第 45 屆眾議院總選舉，是其創黨以來實現政黨輪替的最佳機會，而該黨也確實把握了這個機會。

二、政黨輪替思維與民主黨的角色定位

透過對日本民主黨之成立過程與發展的分析可以發現，該黨原本是由國會議員基於選舉的需要而成立的政黨，權力的核心是在國會黨團，由國會議員主導政黨政策的形成，在權力來源的區分上，屬於「內造型政黨」(internally created party)。民主黨最初是由國會議員本著相同信念－反對自民黨而組合創立，藉由選舉活動而不斷擴張政治版圖。其最初成立的目的，即是「集結所有可能的政治勢力，同時訴諸於民眾的選擇，實現政黨輪替」。因此，不論是黨務還是政務的運作，民主黨念茲在茲的，依然是以「政黨輪替」來創造當代日本政治的歷史。

在這個前提下，民主黨自成立以來即著重在反應多數利益，制定符合多數民意的政綱政見；同時修正過去的社會主義理念與強烈的使命感，以爭取不同立場，多數選民的支持為目的，在意識形態與理念信仰上屬於「掮客型政黨」(broker party)。另一方面，民主黨在各大媒體、各種場合上，均以訴諸日本民眾政黨輪替思維為其文宣的重點，在性質上又接近堅持改變民眾思維理念的使命型政黨。然而，由先前的論述可得知，日本社會的政黨輪替思維自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轉變，並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諸多因素影響下，呈現不可逆的發展趨勢。因此，民主黨所揭櫫的政黨輪替理念，並非為了改變日本民眾的思維理念，而是為了迎合日本民眾的思維理念，完全符合其為掮客型政黨的本質。

即便如此，民主黨在當代日本政黨輪替思維的轉變中，依舊有其角色與定位。首先，在政黨成立背景上，正如先前所述，民主黨的成立是因應當時合縱連橫的政黨競爭，急速增加的無黨派層以及風起雲湧的政黨輪替思維。民主黨內的代表人物如小澤一郎、鳩山由紀夫與羽田孜等三人，均曾在自民黨內擔任重要職務；菅直人則為社會民主連合（1978 年從日本社會黨分離出來的政黨組織）黨員，曾在橋本龍太郎內閣中擔任厚生大臣。其他如岡田克也、前原誠司等人，則是在 1990 年代初期的政黨合縱連橫時期開始進入政壇，進而嶄露頭角。上述民主黨的政治人物，出身背景多不相同，政治理念左右各異，但卻在「對抗自民黨」、「實現政黨輪替」的思維理念下，聚集在名為「民主黨」的組織之下。誠如菅直人在民主黨與自由黨的合併大會上所言：「組成政黨輪替可能的政黨（民主黨）是有其必要的。在兩黨制的體制下，總選舉前的首相人選與政權公約的競爭才有意義」。^⑪若以政黨支持度的變化來看，1998 年與 2003 年

註⑩ 帝國 Data Bank，「新政權および政策に対する企業の意識調査」（2008 年）。http://www.tdb.co.jp/report/watching/press/pdf/keiki_w0809.pdf。

註⑪ 板垣英憲，鳩山家の使命－民主党・鳩山由紀夫の夢と構想，頁 92。

的兩次合併確實為民主黨帶來立即的效果，其政黨支持度與前一個年度相比較，分別上揚 8%與 6%（參照圖 4）。

其次，在政黨理念上，民主黨成立之初即深刻地感受到日本民眾對自民黨政權中「政官財」勾結體制的厭惡，向人民訴求：唯有將自民黨從權力的位置拉下，實現政黨輪替，日本的政治才有未來，才能確立真正的民主主義。^⑳然而，民主黨原本是因為「對抗自民黨」、「實現政黨輪替」而成立的政黨，以致於成立之後的政黨政策定位不明，經常擺盪在「市場化」與「市民化」兩條路線的爭執之間，隨時面臨政黨分裂的危機。其中，市場化路線者主張以自由化對既有的利益共生體制進行革新，而市民化路線者則強調以提升人民福祉、保障民眾生活為優先要務，兩者均為日本民眾期盼的改革方向。^㉑當自民黨的小泉純一郎以「構造改革」、「郵政民營化」等新自由主義思維的政策，成功吸引市場派選民的支持，並於 2005 年的眾議院選舉中獲得重大勝利之後，民主黨也同時在挫敗中確認了走市民化的政黨路線。^㉒2007 年的參議院選舉，民主黨提出「以國民的生活為第一」的政策主軸，與自民黨的市場化路線相抗衡。而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勝選，一方面成功地在政策理念上與自民黨做出區隔，另一方面也為日本兩黨制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其三，在政黨發展上，民主黨在 2007 年參議院的勝選之後，即開始真實感受到日本民眾政黨輪替思維的變化；而日本社會的政黨輪替氛圍，也具體表現在日本民眾對於民主黨政權取代自民黨政權的期盼上。根據 NHK 的問卷調查顯示，從 2008 年 12 月開始，期盼由民主黨組閣的政治思維開始超越由自民黨組閣的政治思維。雖然在 2009 年的 4 月因小澤一郎政治獻金的醜聞，由民主黨組閣的政治思維一度下跌，但同年 6 月之後又回復到 40%的高支持度，由自民黨組閣的政治思維則始終盤旋在 23%與 24%之間（參見圖 5）。對此，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社論分析民主黨在 2009 年 7 月的東京都議會選舉勝因時也表示，雖然民主黨不算是一個「耀眼的選擇」（scintillating choice），但是日本選民求新求變的思維，卻足夠讓民主黨獲得選舉的勝利。^㉓

最後，在無黨派層的對應上，民主黨自成立以來，一方面透過政黨合併積極吸納反自民黨的政治、社會力量；另一方面則以市民化路線與自民黨區隔，爭取無黨派層的支持。根據 NHK 在第 45 屆眾議院總選舉投票前一週的問卷調查資料發現，選舉當日預定前往投票的比率為 73%，較 2005 年眾議院總選舉時的 69%高出 4%。其中，自民黨支持者的投票意願從 81%降為 72%，民主黨支持者的投票意願同為 78%，而無黨派層的投票意願則從 54%上揚至 65%。^㉔這項調查顯示，以政黨印象、保守革新思維

註⑳ 政經俱樂部編，前揭書，頁 280~281。

註㉑ 山口二郎，前揭書，頁 165~173。

註㉒ 山口二郎，前揭書，頁 147~149。

註㉓ Editorial Comment, "Japan is dared to defeat the LDP," *Financial Times* (July 14, 2009).

註㉔ 加藤元宣、藤岡隆史，「政權交代の背景と選挙結果への評価：第 45 回衆議院選挙世論調査から」，*放送研究と調査*，第 59 卷第 11 号（2009 年 11 月），頁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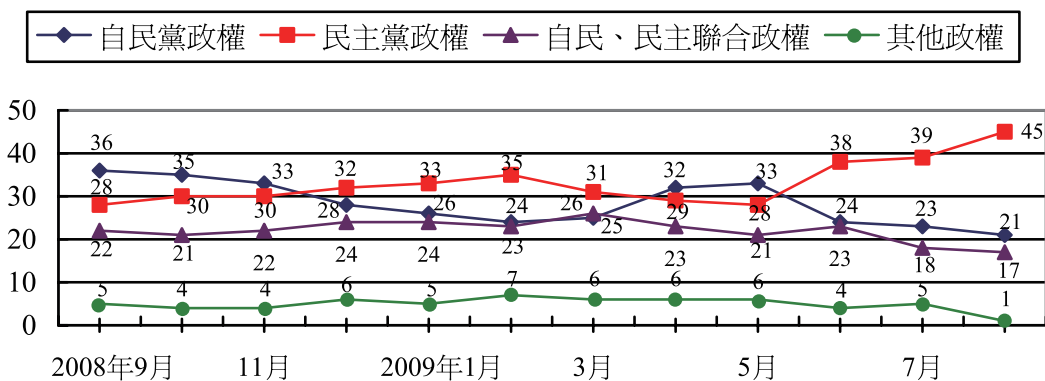


圖 5 期盼的政權形式調查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8 月)

資料來源：加藤元宣、藤岡隆史，「政權交代の背景と選挙結果の評価：第 45 回衆議院選挙世論調査から」，放送研究と調査，第 59 卷第 11 号，頁 7。

進行政治判斷的無黨派層之投票行動，不僅是終結五五年體制的主要力量；也是體現日本政黨輪替思維的轉變，左右 2009 年第 45 屆眾議院總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民主黨的成立與發展，牽動了無黨派層的政治判斷，使其願意以實際行動促成日本政黨輪替的實現。

伍、結 論

日本的政黨輪替思維可上溯自 20 世紀初期的憲政常道思想。此一思想基礎雖然在軍國主義盛行的 1930 年代一時受挫，但在二次戰後初期又一度成為日本政治思潮的主流。然而，在國際冷戰體制的制約下，日本國內保守勢力與革新勢力的競爭，是反映國際間右派資本主義與左派社會主義的對抗，形成了日本的「國內冷戰」思維，助長了自民黨保守政權的延續。這是因為，在五五年體制下，右派穩定的冷戰思維凌駕一切，包括了政黨輪替思維在內。冷戰的結束，讓日本國內保守與革新的勢力不再對峙，原本在意識形態上水火不容的日本社會黨與自民黨，可以組成連立政權（村山富市內閣）；此一發展不僅反映日本政治思維的混亂狀態，也加速了日本政黨的重組。在政治領域思維出現真空的此一時期，伴隨著全球民主化的浪潮，在野黨提出與民主條件結合的政黨輪替口號，適時彌補了政治思想的真空，牽引了 1990 年代日本民主政治的發展。

若回顧 1990 年之後的日本民主政治發展，可以發現，民主黨的成立與發展是當時國內外環境轉變的必然結果。從政治轉變的層面來看，日本選舉制度從 SNTV 改為「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有助於民主黨發展成足以與自民黨抗衡的政黨。而日本兩黨競爭體制的形成，一方面是政黨輪替思維與民主條件結合的具體象徵，另一方面也是實現政黨輪替的政治機制。從經濟轉變的層面來看，一個經濟高度發展，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一方面為日本政黨輪替思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經濟條件；另一方

面，執政黨在經濟上的失政，則強化了社會上政黨輪替的氛圍。從社會轉變的層面來看，國際冷戰的結束，直接影響日本國內冷戰的政治構圖，促成 1990 年代初期的政黨重組；而日本社會也開始解放思維，把關注的焦點從安全、和平轉向民主、公義，中斷 40 年的政黨輪替思維再度應時而起。從政黨理念的層面來看，上述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轉變，具體反應在民主黨的基本理念上，從早期的「反自民黨勢力集結」、中期的「確立兩黨制基礎」，乃至於目前的「以政黨輪替實現真正的民主主義」。民主黨除了以務實的政黨理念向選民訴求之外，也藉由完善的組織運作與理性的政策形成，將其塑造為一有能力、可信任的政黨。

Philip E. Converse 曾言，政治人物的合縱連橫或政黨的重組，要獲得選民固定的表態支持，必須花費以十年 (decade) 為單位的時間。^⑧民主黨的成立與發展，一方面是五五年體制結束後政黨輪替思維轉變的具體象徵，另一方面則是政黨輪替思維轉化成政黨支持的過程與結果。即使日本民眾對於民主黨仍有疑慮，包括：並未提出與自民黨區隔的政策方針、黨內領導人多屬政治世家、黨內政治獻金疑雲、以及與「官公勞」（公家的勞動工會）關係過於密切等。然而，日本民眾對於改變的渴求超過了這些疑慮與不安，並於 2008 年上半年的地方選舉中，充分表達其對政黨輪替的熱切期盼。2009 年 8 月 30 日舉行的第 45 屆眾議院總選舉，距離 1998 年「新民主黨」的成立，恰好是第一個十年；而選舉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也驗證了 Converse 的理論。這次選舉一方面是檢驗日本政黨輪替思維發展的一次重要民主形式，同時也是現代日本實現實質政黨輪替的重要關鍵。在選舉的過程中，不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意識到日本政黨輪替思維發展的關鍵；特別是在野的民主黨，完全以「政黨輪替」作為本次選舉的基調，全力訴求日本中產階級的民主意識，最終獲得選民的認同。透過這次政黨輪替的實現，日本的政治體制將更朝向健全的兩黨制發展；而政黨輪替思維，也將持續成為推動日本民主邁向下一階段的關鍵要素。

本論文以憲政常道時期、五五年體制時期與民主黨時期等三個階段做為分析對象，以政治、經濟、社會與政黨條件為分析架構，探討日本政黨輪替思維的形成與發展。然而，從日本政黨輪替思維這一議題衍生的討論，目前仍有很多空間留待往後研究。特別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諸如國際局勢的變遷、日美安保政策與防衛政策的改變等國際因素，以及都市化、選舉制度變革等國內因素對於日本國內政治情勢乃至於政黨輪替思維的發展，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期盼日後的研究能對此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 * *

（收件：98 年 11 月 25 日，接受：99 年 5 月 18 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註^⑧ Philip E. Converse, "Of Time and Partisan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 No. 2 (1969), pp. 139~171.

The Party Alternation Thinking in Japan: The Roles of DPJ

Shih-Hui L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Kuo-Hsing Ku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Party altern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mocracy. Although the Japanese democracy after World War II proceeded from the enforcement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LDP dominated the Japanese politics since 1955. The party alternation thinking in Japan was limited by the situation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uch as politics, economics, society and parties.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liberated the party alternation thinking in Japan, and led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PJ. This paper aims at the changes of party alternation thinking in Japan based upon the theories of democracy, as well as the aspect of Japa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roles of DPJ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rty alternation thinking in Japan were also propo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party alternation, DPJ, LDP, common practice of the constitution

參考文獻

- 小澤一郎，剛腕維新（東京：角川書店，2006年）。
- 小林良彰、村山皓司、谷藤悦史、武重雅文，現代政治意識論－アノミー・疎外・政治不信の構図－（東京：高文堂出版社，1984年）。
- 小林良彰，現代日本の政治過程：日本型民主主義の計量分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
- 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年）。
- 三宅一郎，政党支持の分析（東京：創文社，1985年）。
- 三宅一郎，選挙制度変革と投票行動（東京：木鐸社，2001年）。
- 山口二郎，政権交代論（東京：岩波書店，2009年）。
- 川島高峰，「戦後の終焉と冷戦後責任－歴史認識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政経論叢，第68巻第2・3号（1999年），頁1~30。
- 上條末夫，政治意識の構造（東京：北樹出版，1978年）。
- 中瀬剛丸、荒牧央、植木宏治，「2 大政党化を志向した有権者：第43回衆議院選挙世論調査から」，放送研究と調査，第54巻第1期（2004年1月），頁16~35。
- 井田正道，「1990年代における有権者の変質」，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紀要，第40巻第2期（2002年3月），頁31~44。
- 升味準之輔，「1955年の政治体制」，思想，第480号（1964年6月），頁759~776。
- 金井正俊，「政党支持率の変遷：朝日新聞社全国世論調査から」，日本世論調査協会報，第70号（1992年10月），頁63~68。
- 片山慶隆，「陸羯南研究の現状と課題」，一橋法學，第6巻第1期（2007年3月），頁369~407。
- 北岡伸一，自民党－政権党の38年（東京：讀賣新聞出版社，1995年）。
- 田中直毅，日本政治の構想（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94年）。
- 加藤秀治郎，憲法改革の政治学（東京：一藝社，2005年）。
- 加藤元宣、藤岡隆史，「政権交代の背景と選挙結果への評価：第45回衆議院選挙世論調査から」，放送研究と調査，第59巻第11号（2009年11月），頁2~19。
- 田中愛治，「選挙・世論の数量分析：無党派層の計量分析」，オペレーションズ・リサーチ：経営の科学，第43巻第7号（1998年），頁369~373。
- 田中愛治、河野勝、日野愛郎、飯田健、読売新聞世論調査部，2009年なぜ政権交代だったのか－読売・早稲田の共同調査で読みとく日本政治の転換（東京：勁草書房，2009年）。
- 江宜樺，「政治判断如何可能？簡述漢娜·鄂蘭晚年作品的關懷」，當代，第150期（2000年），頁28~43。
- 百瀬孝，事典 昭和戦前期の日本－制度と実態（東京：吉川弘文館，1990年）。

- 仲村哲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米騒動（会津若松：歴史春秋出版，2002年）。
- 伊藤惇夫，民主党－野望と野合のメカニズム（東京：新潮社，2008年）。
- 坂田顕一，「民主党のしくみ－組織篇・政策篇」，橘民義編著，民主党 10 年史（東京：第一書林，2008年），頁 143~194。
- 佐藤誠三郎，松崎哲夫，自民党政権（東京：中央公論出版社，1986年）。
- 岸本弘一，国会議事堂は何を見たか－議会政治・激動の半世紀（東京：PHP 研究所，1986年）。
- 京極純一，政治意識の分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
- 阿部弘臣，「民主政治の失敗－戦前期日本の政党政治に関するゲーム論的考察－」，**相関社会科学**，第 18 号（2008 年 4 月），頁 2~15。
- 松本正生，政治意識図説－「政党支持世代」の退場－（東京：中公新書，2001 年）。
- 松岡完、広瀬佳一、竹中佳彦，冷戦史：その起源・展開・終焉と日本（東京：同文館出版，2003 年）。
- 林繼文，「制度選擇如何可能：論日本之選舉制度改革」，**台灣政治學刊**，第 2 期（1997 年），頁 63~106。
- 板垣英憲，民主党派閥抗争史－民主党の行方（東京：共栄書房，2008 年）。
- 板垣英憲，鳩山家の使命－民主党・鳩山由紀夫の夢と構想（東京：サンガ，2008 年）。
- 岡田克也，政権交代－この国を変える（東京：講談社，2008 年）。
- 東恭弘，「民主党の歴史－民主党の旗揚げ・民主党と自由党の合併」，橘民義編著，**民主党 10 年史**（東京：第一書林，2008 年），頁 41~98。
- 帝國 Data Bank，「新政権および政策に対する企業の意識調査」（2008 年）。
http://www.tdb.co.jp/report/watching/press/pdf/keiki_w0809.pdf。
- 前田幸男，「時事世論調査に見る政党支持率の推移：1989-2004」，**中央調査報**，第 564 號（2004 年），頁 1~8。
- 後房雄，政権交代への軌跡－小選挙区制型民主主義と政党戦略（東京：花伝社，2009 年）。
- 政経俱樂部編，民主党の若手議員は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東京：ワンツーマガジン社，2007 年）。
- 高見勝利，「戦後民主主義とその作法：社会啓蒙家としての宮沢俊義」，**法政研究**，第 54 卷第 2-4 合併號（1988 年 3 月），頁 387~422。
- 許志雄，「政黨輪替在我國憲政發展上的意義－從統治機構論的角度分析」，**月旦法學雜誌**，第 61 期（2000 年），頁 26~33。
- 郭斌和、張竹明譯，Plato 原著，**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年）。
- 曹瑞泰，「冷戦後の日本政黨政治」，**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11 期（1997 年 11 月），頁 27~50。
- 傅正主編，雷震著，**雷震全集**，第 9 冊（台北：桂冠出版社，1989 年）。

- 渡辺洋三，*日本社会はどこへ行く：批判的考察*（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
- 蛭田有一，*鳩山由紀夫－蛭田有一フォト・インタビュー集*（東京：求龍堂，2002年）。
- 善教將太，「日本における政治的信頼の変動とその要因 1982-2008：定量・定性的アプローチによる「政治」と政治的信頼の因果関係の分析」，*政策科学*，第17巻第1期（2009年10月），頁61~76。
- 鹽田潮，*民主党の研究*（東京：平凡社，2007年）。
- 榊原夏，*岡田克也－父と子の野望*（東京：扶桑社，2004年）。
- 榎鈞池，「後冷戦時期日本聯合政府與政治改革」，*政治科學論叢*，第16期（2002年），頁63~88。
- 福永文夫，*占領下中道政權の形成と崩壊－GHQ 民政局と日本社会党*（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
- 蒲島郁夫，「98年参院選－自民党はなぜ負けたか」，*レヴァイアサン*，第25号（1999年），頁78~102。
- 藤原郁郎，「民主化指標の考察と検証－識字率との相関分析を通じて」，*国際關係論集*，第4期（2004年），頁67~96。
- 樋口陽一，*比較のなかの日本國憲法*（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
- 樋口陽一，*轉換期の憲法*（東京：敬文堂，1996年）。
- 橋本晃和，*無党派層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
- 鵜飼信成、福島正夫編，*講座・日本近代發達史4*（東京：勁草書房，1980年）。
- Arendt, Hannah, *The Life of Mind, Vol. 1, Thinking* (New York: Brace Jovanovich, 1978).
- Arendt, Hannah,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Delivered at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R. Beiner (ed.),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 7~77.
- Bova, Russell, "Democracy and Liberty: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63~77.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0).
- Converse, Philip E., "Of Time and Partisan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 No. 2 (1969), pp. 139~171.
- Dahl, Robert,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 Dalton, Russell J.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Editorial Commen, "Japan is dared to defeat the LDP," *Financial Times* (July 14, 2009).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 Fukuyama, Francis,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 Free Press, 1995).
- Gurr, Ted,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Political Systems 1800-197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68 (1974), pp. 1482~1504.
- Hamilton, Alexander,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Based on the original McLean edition of 1788).
- Held, David, *Models of Democra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Holbrook, Allyson L., Jon A. Krosnick, Penny S. Visser, Gardner, Wendi L. Gardner, and John T. Cacioppo, "Attitudes toward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itial Optimism, Inertial First Impressions, and a Focus on Flaw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5, No. 4 (2001), pp. 930~950.
-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Third Waves: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 Key, V. O.,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Rationality in Presidential Voting, 1936-1960* (New York: Vintage, 1966).
- Lipson, Leslie, *The Great Issues of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10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7).
- 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 Moore,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67).
- Ramseyer, J. Mark and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anney, Austin, *Governing* (8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1).
- Rae, Douglas W.,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Ray, James Lee,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Evolu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position*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5).
- Sartori, Giovann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award, Michael, "Democratic Theory and Indices of Democratization," in David Beetham (ed.), *Defining and Measuring Democracy* (London: SAGE, 1994), pp. 6~24.
- Skinner, B. F., *Verbal Behavior of Organism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38).

